



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

陷入『割韭菜』的循环 作风建设要避免

□ 贺海峰

2014年10月8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：“作风建设是攻坚战，也是持久战。这么多年，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，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、反而愈演愈烈，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，割了一茬长一茬。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，缺乏常抓的韧劲、严抓的耐心，缺乏管长远、固根本的制度。反‘四风’的实践说明，抓和不抓大不一样，真抓和假抓大不一样，严抓和松抓也大不一样。”

韭菜具有强大的再生能力，当叶片被割掉一茬后，很快又能生长到原来的高度，正所谓“割了一茬长一茬”。习近平总书记用“割韭菜”比喻治理不良作风，生动形象地指明“四风”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，稍有松懈便会反弹回潮、故态复发。

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，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。新时代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破题，小切口撬动大变局，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，推动党风政风为之焕然一新，带动社风民风持续向好。但要清醒看到，“割了一茬长一茬”，是作风建设的一大难点。当前作风

建设仍有盲区死角，如“小事小节论”“影响发展论”“行业特殊论”等错误思想仍有市场，少数党员干部违规吃喝等“四风”问题不时抬头，有的甚至“编谎话”“捂盖子”，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，疏离了党群、干群关系。我们必须高度警惕，靶向发力、系统施治。

韭菜进入生长旺盛期后，再生能力会显著增强。不良作风更是如此，“给点阳光就灿烂”，顽固性、变异性和传染性极强。一遇上适宜的条件，就会穿上“隐身衣”，交叉感染、反复发作。现实中，少数党员干部特权思想严重，不知敬畏、心存侥幸，企图钻空子、打擦边球，在“变相吃喝”“快速送礼”等新花样中乐此不疲、带偏队伍；有的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在抓落实中搞层层加码、移花接木、责任甩锅等，污染一方政治生态，贻误发展良机。同时，由风及腐、风腐一体、风腐交织现象仍较突出，在不同地区、层级和领域都有显现。必须重遏制、强高压、长震慑。对“四风”问题露头就打、严查快办、反复敲打，坚决刹住贪风腐气、官风傲气、惰风暮气，有力遏制不良作风滋生蔓延。

“绝其本根，勿使能殖。”对于不良作风，必须常态化全方位开展“政治体检”，让根源性问题浮出水面。一是抓住思想这个“总开关”。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，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、站稳群众立场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；明红线、守底线、筑防线，不断打扫思想灰尘，纠正行为偏差，养成高度自觉。二是用好监督问责这个利器。紧盯“关键少数”、管住绝大多数，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。紧盯“四风”新动向，深化风腐同查同治，深挖背后搞“小圈子”、以权谋私、利益输送等问题，铲除风腐共生根源。三是抓住制度建设这个根本。把握地区性、行业性、阶段性特点，针对普遍发生、反复出现的问题，持续完善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，进一步织密扎紧制度的笼子。聚焦制度是否真落地、问题是否真解决、群众是否真满意，坚决防止执行中的“破窗效应”，为正作风、治歪风、树新风筑牢坚强堤坝。

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，只有敢于单刀直入、动真碰硬，慎终如始、一严到底，才能管出习惯、抓出成效、化风成俗。各级党委（党组）要把作风建设当作分内之事、应尽之责，敢于直面矛盾、主动担当作为，进一步健全制度、细化责任、以上率下，层层传导压力，级级落实责任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统筹协助、监督两个职责，以铁的纪律、“常”的韧劲、“长”的恒心，切实防止旧弊未除、新弊又生。广大党员干部要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，时时、处处、事事保持清醒头脑，自觉接受党内监督、群众监督，以过硬作风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。

重读经典

1950年9月10日，刘少奇在马列学院（中央高级党校）第二、三班开学典礼上发表《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》的讲话，后收录于《刘少奇选集》下卷。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理论水平薄弱的情况，刘少奇系统分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，论述了如何对待理论学习，怎样学好理论、做好工作、加强修养等重要问题。这篇文献阐述了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，即党员干部学好理论是关系党的事业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，其中蕴含的思想、原则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加强理论武装、学好党的创新理论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。

没有理论，工作就是盲目的，没有前途的

为了让党员干部在中国革命胜利的情况下保持清醒头脑，深刻认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，刘少奇在讲话开篇就直指要害，从当时面临的总体形势指出，“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很好，但理论工作却是很薄弱的一环”，很多干部，甚至是负重要责任的高级干部，“斗争经验丰富，可是理论水平不高”，并强调“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弱点”。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历练，刘少奇对党的特点和革命全局有着深刻洞察。早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就指出过党自成立时就存在的理论水平有待提高这个“极大的弱点”。这实际上是党长期需要解决的一个历史命题。

理论之所以如此重要，刘少奇指出，还在于“受文化和理论水平的限制，就不能有大的发展，碰到问题有的能处理好，驾驭得了，有的就不能驾驭，处理不好”。而这种不确定性的根源，实际上是没有找到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和本质规律，仅凭经验和感觉去处理问题，没有理论作为实际工作的指针，这样“工作就是盲目的，没有前途的”。同时，没有理论就容易被“俘

学好理论是个重大政治问题

——重温刘少奇《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》

□ 王继凯

虏”，“被人家天花乱坠的话所迷惑”。刘少奇清醒地认识到，党的历史上很多人曾被夸夸其谈的教条主义者所迷惑，在革命发展的道路、方式、前途等问题上难以明辨是非、找到正确方向，致使革命走了弯路，“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”，例如“左”的错误，说到底还是理论上的不成熟。所以，不懂理论，万万不行。

历史和现实的分析都对党的理论建设提出了迫切的要求。刘少奇强调，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，而且是一项经常性的任务，“要花十年的工夫才能前进一步”。他号召，不仅要有少数人研究理论，而且要有更多的人研究理论，在职干部也要抽出时间去研究理论，掌握了理论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作。“党需要你们去做研究理论的工作，并且决定给你们一些实际问题去研究处理”，“运用理论观察、解释、处理实际问题，这就是目的”。

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，去观察分析处理问题

怎样才算学好理论？刘少奇首先指出，要广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，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其他一些知识，但“仅仅读了几本书，有了一些理论知识，并不等于就有了理论”，“只是有了运用理论的可能”。这里，刘少奇把“理论知识”和“理论”明确区分开，从本质上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内涵边界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，即学习理论和处理实际问题，或者说理论和实践，永远是紧密相连的，脱离实际的理论学习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态度。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，要用马克思主义之“矢”去射中国革命之“的”，以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。

在革命时期和革命胜利以后，党都会面临很多马克思没有讲过的新问题新挑战，怎样才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，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呢？刘少奇指出，这就是要“用所学到的马列主义的立场、观

点、方法，去观察、分析、处理，并且要处理得不错。这样才叫做有了一些理论”。他强调，学习马列主义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，不要把马列主义变成教条。教条主义者只知道翻书本，但碰到实际问题，就不知道怎样分析、处理，只能生搬硬套瞎指挥。教条主义者迷信苏联经验和“图上作业的战术家”，几乎葬送了中国的革命。那些“吃过洋面包的人”可以熟练地背诵马克思、列宁著作中的词句，并讥笑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，但恰恰相反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以一批革命实践家扎根中国大地，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一个个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，才生长出来。

那么，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？刘少奇进一步剖析了这个理论难点，指出这就“要靠我们创造”，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“对客观材料加以分析整理”，“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”。他以党在不同时期关于富农政策的变化来生动地说明这一问题，指出“过去分富农的土地对，现在不分也对”，因为时间不同了，条件不同了，环境改变了，“这是整个革命形势决定我们这样做的”。今天战争胜利了，要恢复生产，发展生产，就要根据形势作出调整。“这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”，“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”，是党能够不断形成正确思想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秘诀。对于党员干部来说，“在工作岗位上能够运用理论，独立地处理问题和独立工作，这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的结果，这就说明学习有了成绩”。

既有理论，又不骄傲，又有信心做好工作

刘少奇认为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作风建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，理论学习内在包含着党的作风建设的内容和要求。他指出，有了理论，又不骄傲，作风正派，是“马列主义中最重要的东西”。“越是有理论有知识的人，越应该感到自己知道的少。”有了理论，却很骄傲，看不起人家，动不动给人家扣机会主义大帽子，人家就不欢迎你。“学了马列主义，就要把个人主

义、自由主义、命令主义、官僚主义这些东西吃掉”，“一切为了党，一切为了人民”。刘少奇提到的这些内容在1951年中共中央发出的《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（草案）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，决定明确提出“理论学习的不发展，经验主义倾向的存在，正是目前党内一部分干部对于党的政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在工作中缺少坚定性和远见，缺少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，产生官僚主义、命令主义、事务主义倾向，以至功臣思想、蜕化思想的根本原因”。刘少奇深入浅出地阐明，不忘党的宗旨，坚持谦虚谨慎、脚踏实地等优良作风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应有之义，丰富了理论学习的内涵。

同时，刘少奇针对有些同志感到自己做理论研究工作能力不够、信心不足的问题，强调学习理论还要提高信心，勇于担当。“能力今年不够，明年就够了，明年还不够，再搞几年就够了。没有说能力够了再去担负工作的。”他还提到了理论宣传的重要性，指出理论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、十分光荣的工作，是党的事业的重要基础。宣传不是讲空话，而是要讲实际问题。“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很多的理论干部，就不可能领导这样大的国家达到社会主义。”

理论学习牵涉党的事业的诸多要素，关系党和国家的发展、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，关系我们最终能否完成党的光荣使命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是一个须臾不可忽视的重大政治问题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，“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礎，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。对领导干部来说，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掌握得越牢靠，政治站位就越高，政治判断力、政治领悟力、政治执行力就越强，观察时势、谋划发展、防范化解风险就越主动”。党的发展历史表明，党的理论学习是一个长期历史课题。新征程上，面对“两个大局”相互交织、相互激荡、相互影响的新的时代背景，我们更要汲取历史经验，深刻认识学好党的创新理论的重大意义，真正做到学深悟透力行，使党的理论建设和队伍建设在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力量。

国学研究宜从文献整理入手

——罗振玉的治学之道

□ 黄耀明



罗振玉（1866—1940年），原名罗宝钰，号雪堂，浙江上虞人，语言文字学家、教育家、文献学家、考古学家、金石学家、简牍学家、敦煌学家、目录学家、校勘学家、收藏家、书法家。罗振玉治学领域广泛，著作等身。他参与开拓中国的现代农学、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、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、整理敦煌文卷、开展汉晋木简的考究、倡导古明器研究。历史学家张舜徽在《罗振玉学术论著集·总序》中评价其“藏书盈库，著书满家。传印秘籍图录以及甲骨金文，遗碑坠简之属，不下数十百种。嘉惠士林，沾溉无尽，弛声遐迩，为海内外学人所钦服”。

研经以修德

罗振玉喜爱阅读，自幼对经史、训诂潜心学习。他推崇儒家经典，主张治学当以研读和运用儒家经典为基础和目的。16岁时，罗振玉去南京白下书铺看到一部《皇清经解》，非常喜爱，但此书足有1400卷，是清代儒家经学的集大成之作，罗振玉特向父亲罗树勋提出购书请求，用三万文钱买下。他如获至宝，逐册细读，不遗漏一个字，一天读3册，最终竟用一年时间通读了3遍。正是抱着这种对儒家经典的痴迷，他逐渐领悟了研究经史文字的门径，从中获取了宝贵的学术营养，并从此奠定了国学研究基础。

罗振玉曾先后两次讲授《论语》并出版讲义。24岁在淮安做私塾教师时首次讲《论语》，并在《教育世界》杂志发表《论语讲义》，在晚年又应邀

在金州文庙明伦堂讲授一次，并出版《金州讲习会论语讲义》。其讲授的内容贯穿儒家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理念，并强调做学问的目的是助人为乐，不可追名逐利；还讲求实践，倡导学以致用，留给學生诸多启迪。

罗振玉十分重视研经修德的重要性，他认为学习儒家经典能够涵养自身道德。这种思想也体现在其教育主张中，他在《教育五要》中说：“凡一切国民，无论才技如何优美，而德行缺然，如此人者有益于国家乎？有损于国家乎？此不待智者而知之。”

重视整理文献材料

罗振玉以学术的眼光发现、挖掘中国传统文献，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，刊布流传，充分发挥了文献材料补正经史的作用。他抱有“返经信古”的学术立场，一方面为纠当时为今文学不治训诂名物的蔽失，从文献

整理入手重振国学；另一方面为纠时人信今疑古的思潮，欲以国学启迪新知、匡救时弊。

罗振玉喜爱收集金石碑刻，15岁时在读经作文之余，对刻印兴趣浓厚，他看到旧货摊上有一枚汉代私人印章，十分喜欢，就买下佩戴在身上时时把玩，还作为刻印的范本进行学习。16岁时，他在杭州看到了宋高宗所书《孝经》刻石和《石鼓文》刻石，就亲手制作了《石鼓文》拓本。17岁时他与哥哥罗振鋆租赁碑刻拓本800多通，并一起挑灯夜读，进行校勘。一年后写成《读碑小笺》《存拙斋札疏》，因此得到了学者们的引用和称赞，逐渐体会到了整理重要文献补正经史的意义。

随着对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，罗振玉也在搜集、公布甲骨文方面不遗余力，从1903年到1933年，用30年时间收集甲骨和甲骨文拓片，最终积累了甲骨约3万片，成为当时收藏甲骨最多的学者。同时，他还持续刊布这些拓片以供学界研究和保存，出版

了6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：《殷虚书契前编》《殷虚书契菁华》《铁云藏龟之余》《殷虚书契后编》《殷虚古器物图录》《殷虚书契续编》，共公布甲骨文拓片5461张。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，在世界范围内，他刊布的甲骨文拓片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是最多、最好的。因此，郭沫若评价说：“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、保藏、流传、考释，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。”之所以有如此功绩，是因为他认识到古文献的极高价值，也以搜集刊布重要文献材料为其一生使命。他在《殷虚书契前编·序》中说：“今幸山川效灵，三千年而一泄其秘，且适当我之生。则所以谋流传而攸远之者，其我之责也夫！”

同样，得知敦煌文书被盗走后，他不但极力说服学部官员购买剩余部分以防流失，还用16年时间整理出版了7种敦煌图书：《敦煌石室遗书》《鸣沙石室佚书》《敦煌古写本周易王注校勘记》《鸣沙石室古籍残卷》《敦煌零拾》《敦煌石室遗书三种》《敦煌

石室碎金》。除了对文献的收集、整理，罗振玉致力于及时公布出版这些成果，以最快的速度刊布最新资料，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、学习、研究，从而促进学科发展。

罗振玉还用5年时间从法国汉学家沙畹处得到斯坦因所盗汉晋木简的法文摹本，并重新整理和考释，与王国维合著了《流沙坠简》。此书开辟了我国简牍整理和研究的前河，鲁迅给予高度评价：“中国有一部《流沙坠简》，印了将有十年了。要谈国学，那才是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。”

精心考释古文字

罗振玉承继乾嘉学术传统，研究古文字用力极深、范围亦广，在甲骨文、金文、石鼓文、碑刻文字、敦煌简牍等诸多方面均有研究。其中，在甲骨文考释方面成就最大，他与王国维、郭沫若、董作宾并称“甲骨四堂”，董作宾赞许他为甲骨学“开山祖

师”。然而，考释古文字是繁杂精深的工作，其成就取得的背后一定十分艰辛。罗振玉自己在《殷虚书契考释·序》中就对其考释历程进行过描述：“或一日而辨数文，或数夕而通半义。譬如冥行长夜，乍睹晨曦，既得微行，又蹈荆棘。积思若瘁，雷霆不闻；操觚在手，寝馈或废。”

有学者总结了罗振玉的古文字考释之法，细致且全面。首先，罗振玉从《说文解字》入手研究金文字形，再由金文探析甲骨文，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。其次，将甲骨文与历史典籍相互参证。再次，将考释文字放在其在句中通读，考虑其位置和作用，推求字的本义和通假关系。最后，注重偏旁分析，再回归到字的本身。

在潜心研究古文字的同时，罗振玉还以国际视野搜集、整理、刊发文献以求强国济世，在诸多领域皆有建树。如在教育学、农学方面创办《教育世界》《农学报》，编辑出版《教育丛书》《农学丛书》，其中《农学报》是中国最早的农学定期刊物。

罗振玉的学术思想以“传古”为旨归，侧重整理、研究古文献，重视古字、古经、古籍、古物的作用，其“古”实为中国传统文化。他以经学为引领、以文献为着落，旁征博引、精心考释，以精诚专笃之心专注于国学研究。

